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田峰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宁835000)

[摘要]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关键词] 边塞;陇山;关山;夷夏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5)01-0068-07

DOI:10.15886/j.cnki.hnus.2015.01.012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这当然与中国自古以来众多部族错综杂居的现实密切相关。可以说,自有了以中原为地理核心的华夏,也就有了夷狄。先秦古籍中常常将蛮夷戎狄与华夏对举,至少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一套区别夷夏的标准。《尚书·禹贡》已经将疆域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1],其中要服和荒服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以五服制划分疆界的原则,绝非是实际夷夏地理关系的体现,而更多的则是以中原文化为本位理想的疆域构想。其实,从整个世界的疆域来看,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但是人们在实际的认识中总是惯于以本族文化为本位来建构地理形势。《左传》中关于夷夏关系的讨论颇多,但尚无明确的地理意识来区别夷夏,而是以“礼”为核心来区分夷夏^①。以较为明确的地理方位意识区分夷夏则大致是从战国开始的,大约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的《礼记》已经明确以“东、南、西、北”四方位配以“夷、蛮、狄、戎”^[2]。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关于夷夏的辨别主要是从文化与地理两个方面着手的。无疑这种观念对先秦以后的夷夏观念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唐代关于夷夏的讨论以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念为基础,地理与文化因素依然是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准。就南方而言“岭”作为重要的地理文化疆界,是唐代南部最主要的夷夏界线^[3]。以北方而言,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夷夏界线是“塞”。“塞”本身并不是地理界线,而主要指一些军事防御堡垒,这些军事堡垒随着国家边防形势的盈缩不断变化。由于塞在地理上处在边关,人们往往在塞外有完全不同的地理文化感知,这自然使“塞”这一文化意象具有了地理界线的性质。唐代西北地区的塞随着国家军事形势和疆土变化也不断变化,有时候以军事征伐占据点作为“塞”,有时候则以天然的地理屏障作为“塞”。而不同的群体对塞的感知也是不同的,如同同一时期去过西域的人与未去过西域的人各自对西域的地理文化感知有很大差异,唐代不同时期的人对塞的感知也不尽相同。之所以以“塞”作为关照对象,就是因为这一意象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唐人对塞的地理文化感知往往是极为复杂的,而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可以从文化史的角

[收稿日期] 2014-06-20

[基金项目] 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3YJC751051)

[作者简介] 田峰(1980-),男,甘肃会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 《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87页)相反,夷狄无礼仪之盛,故谓之夷狄。对于“非礼”的夷狄不仅以之为贱,而且要对其“不恭”进行武力征伐。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责无礼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443-444页)刘师培也以为“夷夏之防”的重点在于典礼不同,他说“左氏亲炙孔门,备闻宣尼之绪论,故《左传》一书,斥杞子之从夷,先晋人之有信,辨别华戎,大义凛然。及贾逵、服虔诠释传文,而进夏黜夷之谊,隐寓其中。天王天子,夷夏殊称,则华夷殊等,典礼不同,彰彰明矣。”(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3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笔者已撰一文《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夷夏观念》(未刊稿)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处所引即是此文的部分内容。

度来分析时人感觉世界中的“异域”而且从文学角度而言对边疆的地理文化感知也是唐代文学不断发展的动因之一。

一、唐代文学中的西北之“塞”与地理文化感知

唐代西北边疆的变化情况是复杂的,大致可以以安史之乱作为唐代在西北边疆界线变化的分界点。安史之乱前,唐代在西北的边疆总体呈现向外扩张的趋势,不仅在河湟、陇右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在西域的疆域取得了革命性的开拓,最西之疆界一度达到葱岭之西的咸海;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不断东扩,唐在西北的疆界不断缩小,甚至缩小到了陇山之东。疆界的盈缩致使唐人对西北边塞的地理文化感知也不断发生变化。有时候,唐人对塞的感知是明确的、具体的,塞或者是军事堡垒,或者是山川河流;有时候,塞则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泛指边疆地区,更多是一种文化感知。在唐代文学中所言的塞,多数时候指后者。就唐代的西北而言,塞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主要包括了陇山之西的西域、河西、陇东南、河湟诸地,大致与贞元十道之陇右道范围相同。尽管在地理上可以将唐代的西北边疆看作是一块整体的文化单元,但其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从唐代与边塞相关的诗歌描写中分析唐人对西北边塞的地理文化感知。

在唐人的心目中有一些塞是非常明确的,如陇山、萧关、关山、玉关等,这些塞在唐人的诗歌中就有非常直接的体验。陇山意象在文学中的书写是很早的,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的描写令后代的文学家不能忘怀,他们延续了对陇山的文化地理关怀。《乐府诗集·陇头》解题曰:“一曰陇头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即汉陇关也。《三秦记》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4]唐代诗人对陇山的描写是很频繁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对陇山的地理文化感知,而这种感知所渲染的就是愁情。翻检唐诗,只要在诗中提到陇山、陇头、陇水、陇坻、陇坂等意象,诗歌中总是有着浓浓的愁绪。如,沈佺期《陇头水》:“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愁见三秋水,分为两地泉。”^[5]²²²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6]⁷³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二:“青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7]⁵³⁴《胡无人行》:“空余陇头水,呜咽向人悲。”^[7]¹⁷¹²储光羲《陇头水送别》:“相送陇山头,东西陇水流。从来心胆盛,今日为君愁。”^[8]¹⁴¹⁴杜甫《秦州杂诗》其一:“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9]⁵⁷²贺朝《从军行》:“直为甘心从苦节,陇头流水鸣咽。”^[8]¹¹⁸²李洞《段秀才溪居送从弟游泾陇》:“烟沈陇山色,西望涕交零。”^[8]⁸³⁶²张仲素《塞下曲五首》其四:“陇水潺湲陇树秋,征人到此泪双流。”^[8]⁴¹⁵¹李益《从军有苦乐行》:“仆本居陇上,陇水断人肠。”^[10]¹姚合《陕城即事》:“陇山望可见,惆怅是穷边。”^[8]⁵⁷³³孟郊《古意》:“无信反增愁,愁心缘陇头。”^[11]韦庄《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凄凄清清松上风,咽咽幽幽陇头水。”^[12]完全承袭了北朝民歌中的陇头悲鸣。

在唐诗中这种愁绪又往往与羌笛、胡笳等乐器联系在一起,所营造的氛围更加悲愁。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6]⁶⁶张籍《送边使》:“扬旌过陇头,陇水向西流。塞路依山远,戍城逢笛秋。”^[13]¹⁶⁸顾况《王郎中妓席五咏》:“秦声楚调怨无穷,陇水胡笳咽复通。”^[8]²⁹⁶²司空曙《关山月》:“陇头秋露暗,碛外寒沙白。唯有故乡人,沾裳此闻笛。”^[8]³³³¹刘方平《寄陇右严判官》:“胡笳长出塞,陇水半归秦。”^[8]²⁸³⁰李贺《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笛愁翻陇水,酒喜沥春灰。”^[8]⁴⁴³⁰王涯《陇上行》:“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8]³⁸⁸⁵马端《奉送宋中丞使河源》:“部领河源去,悠悠陇水分。笳声悲塞草,马首渡关云。”^[8]³²⁶⁰徐延寿《折杨柳》:“莫吹胡塞曲,愁杀陇头人。”^[8]¹¹⁶⁷无名氏《凉州歌第二》:“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8]³⁷⁹胡笳、羌笛是营造塞外景象最常用的文化意象,是最为典型的“边声”。安史之乱后杜甫到达秦州、同谷,这里林木葱茏、清潭小溪,颇有几分南方的景象,但是杜甫在这里感知最多的却是一些具有边塞特色的文化景观,其中胡笳和羌笛似乎诉说着这里的边塞位置。唐代诗人对陇山的感知来自地理、文化两个层面,地理上的总体感知,许棠《过分水岭》总结得很全面,该诗这样写道:

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蹊梯。云势崩腾时向背,水声呜咽若东西。风兼雨气吹人面,石带冰棱碍马蹄。此去秦川无别路,隔崖穷谷却难迷。^[8]⁷⁰⁴⁰

这些平常的自然景观,在陇山感知就有了体验者个人的理解,他们往往会将这些普通的意象构筑为

典型的边塞意象,寒雁、凋草、白草、塞草、塞云、朔云、寒霜、寒沙、冻水、陇月等意象就是作者主观感受的物象外化。至于文化上的感知也是有一系列意象群组成的,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胡笳、羌笛外,还有胡兵、胡骑、羌女、征人、戍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陇山这一地理景观作为诗题的诗歌也屡有见及,最典型的就是以乐府旧题创作的《横吹曲辞·陇头水》,王维、张籍、王建、杨师道、皎然、翁绶、于湊、李咸用、罗隐等十多位诗人都有以此题创作的诗歌。这说明陇山意象承载了很多唐人对边塞的地理文化感知,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象征。

与陇山意象相比,在唐代诗歌中关山这一意象出现的频次更高。陇山在唐代的诗歌中有时候也叫关山,有时候是指陇山南段的山脉,有时候甚至指今六盘山至陇山这一南北走向的极长山系。我们可以在唐代诗歌中找出很多关山意象,如杜审言《赠苏味道》:“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14]王勃《散关晨度》:“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15]王昌龄《青楼怨》:“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16]李白《紫骝马》:“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树迷。”^{[7]434}《长相思》:“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7]244}孟浩然《凉州词》其二:“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17]杜甫《洗兵行》:“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9]514}卢仝《听萧君姬人弹琴》:“关山险隔一万里,颜色错漠生风烟。”^{[8]4402}宋济《塞上闻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8]5386}戴叔伦《从军行》:“西风垄水寒,明月关山悠。”^[18]李益《夜宴观石将军舞》:“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10]118}柳宗元《铜鱼使赴都寄亲友》:“行尽关山万里馀,到时间并是荒墟。”^[19]温庭筠《回中作》:“千里关山边草暮,一星烽火朔云秋。”^[20]唐诗中关山意象不胜枚举。关山意象与陇山意象一样,其抒发的主情调依然是离愁别绪。行人在关山一带的地理文化感受依然是边塞的典型风光。逾越关山给人感官和心理的体验都是极为复杂的,这一意象自汉代以来被不断呈现,特别是关山的月亮意象被无限渲染。唐人乐府旧题《关山月》的创作就是汉代以来对关山不断构筑的延续。唐代的《关山月》不仅取材范围扩大,而且在艺术形式上显得更加灵活多样,五古、五绝、长律、杂体多种形式创作都有。唐代诗人《关山月》的创作就有二十余篇,卢照邻、沈佺期、杨巨源、王建、储光羲、李白、司空曙、崔融、张籍、戴叔伦、徐九皋、李咸用、李端、翁绶、耿漳、陈陶、顾非熊、长孙佐辅、鲍君徽等诗人都有此题之作。这些诗歌都是以关山之月为媒介,表达诗人怀乡思人的情怀。张籍的《关山月》很能代表唐人对关山的地理文化感知:

秋月朗朗关山上,山中行人马蹄响。关山秋来雨雪多,行人见月唱边歌。海边漠漠天气白,胡儿夜度黄龙碛。军中探骑暮出城,伏兵暗处低旌戟。沙碛连天霜草平,野驼寻水碛中鸣。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可怜万国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13]80-81}

纵观唐代诗歌有关关山、陇山意象的书写,总是离不开一个“愁”字。为什么陇山、关山在唐人心目中有如此的愁绪呢?这一方面与乐府旧题所形成的书写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陇山作为边塞的地理文化体验相关。萦回高峻的陇山是西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越陇不仅是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的变化,更重要的也是作者心态的变化。固然陇山一带“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21]的地理边防形势使唐人对这里有非同一般的体验,但汉魏以来人们对边塞文化的记忆随着唐代对边疆的经营不断加深,也使关山、陇山等地理意象有了文化的标记。以此意象为中心的诗歌之所以会表达“边愁”的主情调,从文学创作本身的角度来看,也有取象造境的艺术考量。可以看到,上面所引诸多诗歌大多都是以陇山、关山来取象造境的,这其实与钱钟书先生在分析《君子于役》时所言“冥色起愁”^[22]的艺术手法是一致的。

除了本文中所举的关山、陇山二意象之外,玉门关、阳关、萧关、大散关、燕支山、河塞、凉州、金城、河源、天山、沙碛等地理意象也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举。

当然,塞作为地理疆界只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形态,而对于文化的感知才是其内核,自先秦以来,文化才是区分夷夏的实质所在,所以越塞之后唐人对异质文化的感知同样强烈。这些异质文化有些以比较明显的形态存在,而有些则显得隐蔽。在唐人的诗歌创作中这些异质文化的表现是很复杂的,举凡人种、音乐、语言、习俗、信仰等诸多方面。例如,诗人们对于边塞地区人种的感知就很强烈,李白在他的诗歌中对塞外的人种有直观的描述,他在《上云乐》中写道“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仪容,戍削风骨。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谗谄貌,岂知造化神?”^{[7]258}绿眼深眸,黄发卷

曲,眉长覆眼,鼻巨压唇,非常形象地将胡人的长相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边塞的音乐文化前面已有所讨论,胡笳、羌笛是最常见的意象,这些音乐在中原人士的审美世界里,不再是简单的音乐,而是幽怨和哀愁的象征。如刘商《胡笳十八拍》第十八拍“出入关山十二年,哀情尽在胡笳曲。”^{[8]3451}刘长卿《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汉境天西穷,胡山海边绿。想闻羌笛处,泪尽关山曲。”^{[23]44}等反映的正是边塞的音乐文化。边塞音乐的感知在唐人的诗歌中有频繁的呈现,此处不再赘举。人种与音乐造成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体验,在边塞文化景观中尤为显眼,李白《猛虎行》所谓“胡人绿眼吹玉笛。”^{[7]463}李贺《龙夜吟》所谓“髻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8]4453}耿漳《凉州词》所谓“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8]380}这种绿眼胡雏牧马吹笛、蕃歌缭绕的景象确实是边塞典型的文化景观。

除了人种、音乐之外,语言变化尤能反映边塞文化的深层次变异,唐代在胡人统治区往往有汉蕃两种语言流行,形成了一种交织的文化现象。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其四“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7]1272}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24]905}反映的正是边塞地区语言所发生的变化。胡人除了对唐人统治区进行军事上的蚕食外,改变着装,学习胡语是他们文化上的策略,我们且看张籍的《陇头水》:“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13]308}可以看出,在胡人的统治下,强迫汉人子孙们穿胡装,学胡语。当然,在汉人统治的边塞地区,也有胡人被同化的现象,王建《凉州行》:“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丝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8]3367}蕃人不仅放弃游牧生活,种植禾黍,养蚕缫丝,而且也学习汉语。通过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了解胡汉两种语言往往在边塞地区并行,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岑参亲旅西域,对西北边塞的语言变化有更深入的感受,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到语言差异所带来的疏离之感,如他在《轮台即事》中写道“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6]156}《奉陪封大夫宴》:“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6]161}《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6]176-177}胡歌、胡乐、胡书三个文化意象构成了岑参在西域的认知,其中语言的感知最为强烈。唐代中后期河西边塞多数时候为吐蕃所统治,但是归义军也曾经收复了一些失地,失地一旦收复,文化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如《全唐诗补编》中有一首诗题目残缺的诗如此写道“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尚□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25]84}这是一位唐人看到失地恢复后文化的变化情况。不仅中原传统的耕作方式得以恢复,且人们的衣着打扮也回归到了自己的文化本位。这从另一面说明,蕃人统治区的唐人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诸方面曾经一度被迫沾染了蕃人的传统。

边塞地区的文化还可以通过宗教来观察。河西一带的宗教更多受到了异质文化的影响,《敦煌廿咏》中就保存了当时敦煌袄教的发展的一首诗《安城袄咏》,诗中这样描写当时敦煌袄教的情况“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零祭处,朝夕酒如绳。”^{[25]81}一些汉地的民间信仰也传到了边塞,与胡文化杂糅,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祭祀仪式,如王维对凉州赛神仪式的描写,《凉州郊外野望》:“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婆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26]140}《凉州赛神》又道“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26]141}王维所描述的祭祀本身是中原人祭祀土神的仪式,但是在这种仪式上,击箫鼓、吹羌笛,又将胡人的一些文化因素杂糅其中,形成了凉州独具特色的赛神仪式。这一仪式是胡汉文化结合的结果。

边塞地区的文化变化还体现在生活风俗方面。唐代官员的生活习惯也受胡文化熏染,如岑参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写道“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6]188}在酒泉太守的一次宴席上,他们听着胡儿伴着羌笛琵琶,载歌载舞,席间官员们吃着烤牛肉、烹骆驼,喝着西域美酒,酩酊大醉。这是胡人生活习惯在唐人统治区的渗透。有时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在蕃人统治时期也不得不发生变化,敦煌残卷第2555页中有一首写于除夕之夜的诗歌,其中有言“荒城何独泪潸然,闻说今宵是改年。”^{[27]30}《除夜》)对中原人士来讲这是多么浓重的节日,但是这样的日子在边塞悄无声息,甚至要从别人的口中才能得知除夕的到来,“闻说”二字很好地反映了这位作者的尴尬境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边塞地区如果被胡人统治,一些生活习俗消失得很快。这是外部文化强势干预的结果。

唐代有关边塞的地理文化意象是很多的,可以组成很多意象群,只是有些是典型的,而有些是非典型的。我们细读唐代对一些重要边关描写的诗歌,就会发现很多地理文化意象并非都是诗人的直接体验,多数一生从未去过边塞的诗人也同样对此有大量描写。这就说明这些重要的关塞意象承载了唐整个时代对边疆的一种体察。这既有长久以来边关文化不断延续的时间因素,也有时代特征影响下的空间因素。时间与空间的二重体验往往会使一些意象显得极为厚重。

二、西北之“塞”与夷夏之辨

先秦古史中,夷、夏对举,最早就是地理关系的对立,夷乃东方之人,“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28]而后所谓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的划分,也是基于地域文化因素的考量为多。所以,先秦时期夷夏之辨虽以“礼”(文化)为核心,但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发展的不同将夷与夏限制在各自生活的范围内。“内诸夏外夷狄”的夷夏观念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地域的悬隔。宋人林之奇在解释五服制时说“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谨于华夷之辨。其所以画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极其严。”^[29]因此,华夷之辨与疆土的拓展及边疆的防守是分不开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因如此,秦汉时期一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被当作关塞,或修筑一些防御工事以阻隔夷狄,不管是作为地理界线的关塞还是作为军事戍守堡垒的关塞,其阻隔异族的功能是一致的。因此,秦汉以来统治者极为重视塞的防御功能。蔡邕《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议》:“天设山幕,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30]江统《徙戎论》:“蛮夷戎狄‘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险阻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31]这说明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关塞起了阻隔异族的重要作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些关塞的设置,确实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藩护中原的目的,而且一些重要的关塞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但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关塞附近的“内”与“外”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陇山西边的秦州,在地理文化方面与陇山东面的陇州并无太大差距,但是在文学语境中,因陇山的存在,书写者更愿意把山两边地域文化差异扩大化。东汉张衡《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32]就是以陇山作为夷夏的界线。唐代延续了秦汉以来这种以地理区分夷夏的观念,希望通过地理的悬隔来保证中原文化的正统性。狄仁杰说“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33]¹⁰³⁵唐德宗也曾言“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34]这样的观念在唐代诗人中也极为普遍,辛常伯《军中行路难》:“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中外分区宇,夷夏殊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8]⁷⁴³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顾无庙堂策,贻此中夏殃。”^[8]⁶⁸⁸沈佺期在逾白石岭时写道“兹山界夷夏,天险横寥廓。”(《自昌乐郡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5]¹³²宋之问在发大庾岭时写道“巖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早发大庾岭》)^[5]¹⁴⁹李益写海东的新罗时云“片帆通雨露,积水隔华夷。”(《送归中丞使新罗策立吊祭》)^[10]⁸⁴杜甫在写成都府之西的西山时曰“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9]⁹⁰⁵确实,在唐人心目中山川关隘屏蔽中夏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即使是唐代的疆土延展到葱岭之西的咸海时,一些重要关塞所承载的夷夏区分观念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它们依然是唐人的心理防线。上文我们所论很多诗人在过陇山、关山时如此强烈的地理文化体验,显然是先秦以来以地理屏障严防夷夏的延续。

唐代在西北的塞是很多的,这些塞都具有区分夷夏的地理文化功能。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但是,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35]以塞为界所划分的地理空间一方面与国家的疆界拓展、边疆经营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些空间一旦划分,往往会影响人们在这一空间中的文化感知。唐代的塞外有时候属于唐土,有时不属于唐土,这种现实使唐人对塞外的感知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在唐人统治的塞外区域汉文化更加发达,在蕃人统治区域胡文化更加盛行。这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时有反映,如敦煌发现的佚名诗人《冬日书情》:“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27]¹⁴《夏日途中即事》:“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27]¹⁷《临水闻雁》:“心殊语异情难识,东步西驰意不从。”^[27]¹²《秋中霖雨》:“山遥塞阔阻乡国,草白风悲感客情。”^[27]¹³《忆故人二首》其二:“左右不闻君语笑,纵横只见唱戎歌。”^[27]¹⁷⁻¹⁸《晚秋登城之作二首》其一:“孤城落日一登临,感激戎庭万里心。乡国云山遮不见,风光惨淡益愁深。”^[27]²¹马云奇《九日同诸公

殊俗之作》:“一人歌唱数人啼,拭泪相看意转迷。不见书传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27]53}在吐蕃统治区域的汉人,不仅切身感受着异域的自然景观,而且对“戎俗”又更为强烈的体验。作为没蕃的汉人,他们身在其中,尽量避免被胡化,所以这种感知代表了他们尽力保持自身文化的努力。但是,有时在胡人统治的区域感知最深的却是汉文化。刘元鼎出使吐蕃时曾经遇到了一个吐蕃沦陷区的丰州人,他记载了令人动容的一幕“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33]7360}在一些吐蕃统治的区域,汉人依然尽力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一些从中原出使蕃域的人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胡文化,反而是汉文化。这就说明区域的变化虽然在客观上会波及到文化的认同,但不是决定性的。刘元鼎在吐蕃统治区对汉文化的感知,就说明华夷的分别最主要的还是文化。

塞作为地理文化的界线,并不是唯一的。在最接近中原地区,西北的塞主要指阴山、贺兰山、陇山一线。有些时候,黄河也被作为塞。而在河西走廊,最西段的塞是玉门关、阳关,在此两关以西的一些重要城市也被认为是塞。这些塞界其实是唐人夷夏文化体验的重要界线。屈同仙《燕歌行》:“汉兵候月秋防塞,胡骑乘冰夜渡河。河塞东西万余里,地与京华不相似。”^{[8]2125}河塞的存在,使诗人感觉到了地理文化与京华的区别。阳关和玉门关往往是唐人最后的边塞防线,诗人们对这里的心里体验又不同于其它的关塞。这两个意象在唐诗中大量出现,反映的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夷夏之界的最后屏障。对于中原的人来讲,玉门关和阳关的遥远是事实存在的,唐人的很多诗歌中叙写这种遥远,如杜甫《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9]626}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26]405}高骈《赠歌者二首》其二“便从席上风沙起,直到阳关水尽头。”^{[8]6975}刘长卿《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阳关望天尽,洮水令人愁。”^{[23]75}这里的远更加增添边关的愁绪,当然这种愁绪和陇山一带相比愁情更甚。王建《秋夜曲》其一:“玉关遥隔万里道,金刀不剪双泪泉。”^{[8]3383}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陇坂肝肠绝,阳关亭障迂。”^[36]刘威《伤曾秀才马》:“秋归未过阳关日,夜魄忽销阴塞云。”^{[8]6584}毫无疑问,诗人对阳关、玉门关之愁的体验与不断加深的胡文化体验是分不开的,岑参“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李主簿》)^{[6]168}两句诗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玉关以东尚能感觉到汉族最为隆重的除夕气息,但是玉关以西只能留给人更多的惆怅,这种愁绪的体验是夷夏文化不同的强烈反映。正因为如此,阳关、玉关等关塞除了具有绝决悲愁一面外,还有脉脉温情的一面。对那些从西域归来的中原人来说,阳关、玉关却是回家的路。岑参《过酒泉以杜陵别业》:“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6]176}李白《王昭君二首》其一:“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7]298}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26]408}我们可以从反面去理解这些诗歌,关塞之东的“杜陵处”、“汉家秦地月”、“故人”显得那么熟悉、温馨,就是因为玉关和阳关有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回归,越过这里的关塞向东行进自然会使人感触到温情。从玉门关、阳关向东,诗人们对凉州的体验就是一种文化的回归。如唐人李端《千里思》:“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泛泛下天云,青青缘塞树。”^{[8]341}元稹《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37]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8]9896}姚合《送少府田中丞入西蕃》:“若问凉州事,凉州多汉人。”^{[8]5672}白居易《感白莲花》:“忽想西凉州,中有天宝民。”^{[24]2272}河西之地凉州虽属塞外,但这里的文化对唐人或多或少有一种归属感。安史之乱后,杜甫路过陇右的秦州,他在这里也是有双重体验,如他在《雨晴》中写道:“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9]601}这里地理在上更加接近南方,在文化上汉文化占主导地位。杜甫所看到的秋云、西风、塞柳、山梨、大雁等都是极为普通的景象,但是塞柳和胡笳两个意象却点明了这里的边塞性质。显然,很多意象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知所写,想象的成分居多,并不是它们确实具有边塞的性质。玉关、阳关之东的凉州与秦州同属边塞,由于杜甫未曾去过凉州,他对秦州的地理文化感受自然是边塞文化居多。对于去过凉州诗人而言,秦州的“边”也许微不足道。

我们知道,在边塞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往往是通过军事斗争的方式产生接触,一旦一方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他们会在新占领的区域强制推行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转变甚至在当下就可以发生,产生变化的内容包括生活、习俗、信仰、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所以,我们区别夷夏,固然要考虑地域因素,但文化

的变化才是夷夏之辨的核心。

三、结 语

唐代西北边塞的变迁伴随着夷夏地理文化体验程度的不同。一般而言,塞越是远离中原,人们对胡文化的体验就越强烈,所以越塞与其说是一种地理感受,毋宁说是文化体验。唐代文学中塞有时候是具体的,有时候是模糊的。唐代诗人通过集体建构,形成了有关边塞地理文化体验的诸多意象。这种文学书写,除了深深打上西北边塞地理文化变迁的客观烙印之外,每一个个体诗人的主观体验也不断丰富着边塞文化的内涵。我们从感觉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唐代文学中的“塞”,不仅能够看到边塞的一些重要的地理文化意象,而且通过这些意象也可以判断时人观念世界中的边塞及其所反映的夷夏文化观。

[参考文献]

- [1] 孔颖达. 尚书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67-170.
- [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59-360.
- [3] 田峰. 唐代诗人对五岭的地理感知与“华夷”之界[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9): 1-6.
- [4]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11.
- [5] 陶敏. 易淑琼.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6] 陈铁民. 侯忠义. 岑参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 蟾蛰园. 朱金城. 李白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8] 彭定求. 等. 全唐诗(增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9]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范之麟. 李益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11] 韩泉欣. 孟郊集校注[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47.
- [12] 聂安福. 韦庄集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52.
- [13] 徐礼节. 余恕诚. 张籍集系年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4] 徐定祥. 杜审言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82.
- [15] 蒋清翊. 王子安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80.
- [16] 李云逸. 王昌龄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47.
- [17] 佟培基. 孟浩然诗集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417.
- [18] 蒋寅. 戴叔伦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19.
- [19]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80.
- [20] 刘学锴. 温庭筠全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99.
- [21]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65.
- [22] 钱钟书. 管锥编: 一[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174.
- [23] 杨世明. 刘长卿集编年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24] 谢思炜. 白居易诗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5] 陈尚君. 辑校. 全唐诗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26] 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7] 高嵩.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 [28] 章太炎. 章太炎文选[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243.
- [29] 林之奇. 尚书全解: 卷 11[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0] 邓安生. 蔡邕集编年校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207.
- [31]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29.
- [32] 萧统.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7.
- [33]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4] 王钦若. 杨亿. 等. 册府元龟: 卷 17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050.
- [35]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92.
- [36] 陈熙晋. 骆临海集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33.
- [37] 元稹. 元稹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81.

[责任编辑: 林漫宙]

(下转第 114 页)

On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Coincidence and Its Revelation

CHEN Dong¹, YANG Ze-lin², ZAN Sheng-feng¹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Hainan Local Taxation Bureau, Haikou 570206,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ultural embeddedness” theor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incidenc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economic behavior, it discusses how to examine and select the cultural elements that coincide with the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consumers, and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adequately embedding the relevant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marketing activities of products so as to affect the shopping process of the consumers. This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llow the tren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closely, and foster the new cultural demands.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coincidence can make the cultural enterprises avoid the risks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while opening up the new idea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Key words: cultural elements; cultur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coincidence; cultural demands; cultural industries

(上接第 74 页)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ortress and the Yixia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IAN Feng

(School of Libera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835000, China)

Abstract: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distinguish the Yixia.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people had got used to identifying the Yixia with the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region, which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the Tang Dynasty. While the culture was regarded as the core to distinguish the Yixia,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lso became the important standard for the people of the Tang Dynasty to perceive the Yixia cultures. Among th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some important fortresses became the typical images for the contemporaries to perceive the Yixia cultures. Som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fortresse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ten became the focal points among the literati.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ortress and the Yixia in the concept world of the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perception of the fortresses in the Northwest among the writer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frontier fortress; Long Mountain; Guan Mountain; Yixia